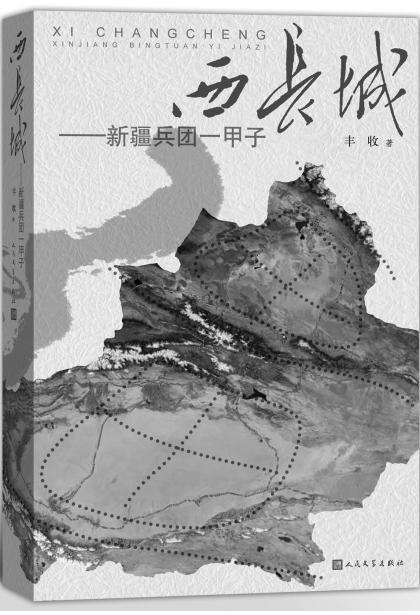


▼三味斋



新疆作家中，丰收以纪实文学创作见长，成就卓著。作为新疆屯垦戍边的第二代，他有一种强烈的兵团情结和边地意识，30余年来持续书写兵团，将这一“群落”独有的生存风貌和人文景观，真实而丰富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来自兵团的内部报告》《西上天山的女人》《镇边将军张仲瀚》等，都是他写兵团的代表作品，产生过广泛影响。

现在，丰收又奉献了一部写兵团的近40万字长篇力作《西长城——新疆兵团一甲子》。展读这部具有史诗品格的“非虚构作品”，不时被一种“挥剑决浮云，铸剑安天下”的兵团精神所激励，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和他们鲜活的故事所感动，更被作者基于历史意识和现实责任而焕发的

人文精神所感染。

丰收的纪实文学写作，仍坚守了“文学”的本真理想，拒绝被平庸的“报告”拉下水去。与此同时，丰收还有一种很强的文体意识。他一如既往在探索纪实文学表达“现实”的可能性，变换手法，强化变现力，拓展包容度，使之呈现“现实”的广度与深度、丰富与细微。《西长城》以“屯垦天山下”、“酒与水”、“家国女人”、“西部的浪漫”、“西长城”、“年轻的城”6卷为基本架构，以28个章节为构件，尔后注入文字的丰饶与澎湃。这使全书既有骨架，又有血肉和灵魂，写得有章有法，收放自如。在一种被限定的自由中，恰恰获得了表达的自如。作者有时是言辞滔滔的政论家，有时是引经据典的史学家，有时是冷峻从容的叙述者，有时是善感抒情的诗人。丰收将这些身份合而为一，融为一个运筹帷幄、似乎掌握了百般武艺的纪实文学家。《西长城》的写作，涵盖了兵团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宏观的、全景式的。而支撑这一“宏观大厦”的，是分布在28个章节中的具体而微的事件、场景、记忆、人物、命运等等。在有规有矩的纪实文学写作范式中，作者引用并糅杂了史志、书信、日记、电文、诗歌、统计表、口述实录、历史档案等一手资料，镶嵌、插入、叠加、切换，写作手法趋向综合，全书呈现出一种时光交错、色彩斑斓的“跨文本”效果。

《西长城》的特色，在于丰收为“报告”的血肉注入了“文学”的灵魂，处处可见人性视角和人文关怀，自始至终都保有一种

激情和热爱去书写他人。是“文学性”赋予了全书一种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更具体一点来讲，《西长城》的成功有至关重要的两点：一是以小见大，以小写大，从微观、具体、细处入手，用“小”去破除“大而无当”的魔咒；二是贴近人和人的内心去写，写出了人的身世、故事和传奇，更写出了人在荒原的命运。人物也不仅仅是一些有着“先进事迹”光环的人物，他们已被还原为一个个具体的、鲜活的、有血有肉的人。

《西长城》写到的有名有姓的人物有上百个，他们只是兵团250万人众中的一小部分，但他们的故事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在资料收集、实地调查、采访等方面，足见作者是下了一番大功夫的。在他那里，写作几乎变成了一次紧迫的“抢救性”工作，写下的文字必须无愧于自己的文学，无愧于“兵团一甲子”，更无愧于众多的“他者”。

书中写到的人物，上至将军下至战士、农工。作者既写兵团创始人王震、陶峙岳、张仲瀚这样的“大人物”，写他们的殊途同归、志同道合，以及开发新疆、建设新疆的气度与魄力，同时以极大的热情，去书写兵团“小人物”，以及他们作为西部拓荒者的可歌可泣的故事。通过丰收的书写，“小人物”的形象跃然纸上，他们的故事令人难以忘怀。我们记住了一天开荒三亩三的坎土曼大王方喜成，记住了用一公斤粮票找到老婆的理发师小麻子，记住了直到退休还是大田工人的陈淑惠，记住了30年只回过一次老家、临终时因愧疚于母亲而哭泣的棉花专家陈顺礼，记住了在阿勒泰和海南

□沈苇

之间像候鸟一样迁徙的育种夫妇韩新城和尚君华，记住了在博尔塔拉草原冬窝子建立第一所小学的顾薇君……这样的“小人物”，在书中不胜枚举。丰收的书写，有一种平等目光，体现了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以及重史历史、复活细节的出色能力。

“以小见大、以小写大”，是《西长城》突出的艺术特点之一，我称之为“宏大叙事下的细腻讲述”，足见丰收对兵团题材翻耕之深之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大时代脉搏的把握、对大场景描述的把控有所欠缺和不足。相反，对大事件、大场景的描述，丰收也是得心应手的。譬如新疆和平起义、数千人拉爬犁运石头修和平渠、湘女出塞、中印战争、石河子建城、喀喇昆仑山公路的修筑等，气势恢弘，笔力雄健，极具震撼力，具有我们通常所说的“史诗品格”。作者在《西长城》中的视角既是全景式的，同时又降低自己的“俯瞰”，在“具体”之中不断切换，从而实现了宏阔与细微、“大”与“小”的有机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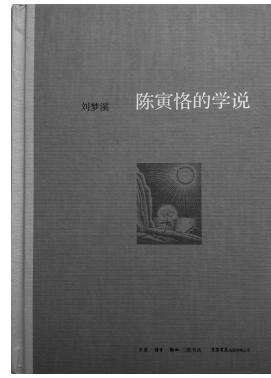
屯垦兴则西域兴、屯垦废则西域乱，这是人们从汉唐以来西域屯垦史中得出的一个真知灼见。从丰收个人来说，通过《西长城》的写作，其早年的“荒原情结”已转化为今天的“兵团精神”。从这个意义来讲，《西长城》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现实意义，也为中国屯垦史研究乃至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考察提供了一个厚重而可靠的文本。

（《西长城——新疆兵团一甲子》，丰收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

▼新书品荐

特约撰稿:李林荣

《陈寅恪的学说》，刘梦溪著，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8月出版



有关陈寅恪先生的传记、评传类图书，已经出了不少，但专门聚焦于他的治学经历和学术成就的传述、阐释性质的著作还不多见。原因之一，大概在于走进陈寅恪先生的学术世界，本身不容易，走进之后再要对做深入浅出的说明，就更有难度。这本《陈寅恪的学说》，汇聚作者反复研读陈寅恪先生学术著述的心得，以原典解读、身世疏证来映照精神思想，着力呈现陈寅恪身为史学家和思想家的独特形象。全书叙述晓畅，论析明快，便于通读、通解，在常流于深沉艰涩的“陈学”专书中，堪称不可多得。书分8章。第一章“学问人生和心路历程”，历述陈寅恪学术人生全程。第二、三章以“工具·材料·观念·方法”和“打通文史”为切入点，结合研究实例，揭示陈寅恪学术思维特质。第四、五章从“中西体用”和“种族与文化”角度，辨析陈寅恪的文化信念和文化态度。第六章“陈氏阐释学”从“了解之同情”、“比较阐释和心理分析”等六方面，探究、概括陈寅恪处理文献、建构学说的基本策略。第七章“佛典翻译和文体革新”总结陈寅恪在文体学和文论批评上的独到主张。第八章“陈寅恪学说的精神维度”将陈寅恪道德文章的过人光彩，论证、归结为表里相衬的三个层次——“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义宁陈氏一族的‘优美风范’”。书后附录“陈寅恪的学说为何有力量”取自作者演讲，对全书主旨和理路，又有通脱、恳切的重申，也值得一读。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王力主编，马汉麟等执笔，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8月出版



这本书源自20世纪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原为书中两个单元的通论，旨在介绍上古以来历代器物、制度、习俗等方面起源、沿革的常识。参与书稿的撰写和审校的文史专家，均为一时之选。最近出的这一版，是该书的插图修订第四版，图片和正文都依据新的考古研究成果，做了全面的增补和修正，内容更加丰富、可靠、严谨。全书包括“天文”、“历法”、“乐律”、“地理”、“职官”、“科举”、“姓名”、“礼俗”、“宗法”、“宫室”、“车马”、“饮食”、“衣饰”、“衣物”，共14章，配有插图百余幅，每幅插图都附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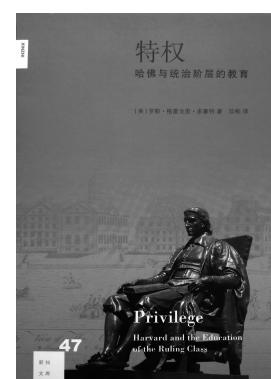
确切的注文说明，有些插图文长达数段，甚至一两页。通读全书，如同穿行在博物馆的陈列厅，一边比照着文字说明，观赏细节毕现的实物图像，一边随着篇章分隔出的知识单元，感受系统的专题知识。与一般类似的读物截然不同的是，这本书的正文和图注，字字句句都写得非常精细，不仅很讲求专业知识表述的准确和分寸，而且特别体现出一种既通俗、洗练，又富有个性神采的生动风格。行文间，对各种史料文献和学术观点，收放自如的旁征博引和透彻明辨，随处可见，时时显示出传递知识的语言形态并不亚于知识本身的那份魅力。

《内外之间:屏风意义的唐宋转型》，李溪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



与空间相关的种种说法，在近年的文化、文学理论圈里日益流行开来。一些艺术家和作家在具体的创作构思中，也似乎受到了影响，时有刻意凸显某种空间感觉的努力。但在艺术史和日常生活史的实际中，空间究竟如何表现，这表现又如何渗透在时间当中，与个人和社会心理的流变形成如何的关联，却还少有能够落实到具体一事一物的详尽考察。《内外之间》这本书所梳理、研究的屏风，正是一件在悠久的历史维度上积聚了丰厚文化意义的空间标识物。它属于家具，却又在家具中流落边缘。它常常图案、造型装饰，却又经不住像别的艺术品那样被长久珍藏。依书中考证，屏风的历史出身古老而威严。早在周礼中，屏风从图饰、形制到实用，就都有象征神性、王权的意义。屏风所在，即权力所在；权力所在，也即公共空间所在。随历史推移，屏风的形式和意义，一路下行，趋于多样。与书中第三、四、五章对应的书名副题中的关键词“唐宋转型”，正是指隋唐五代至南宋这一时期，屏风的变异，终于发展到了彻底背离其历史出身的节点，分化出了隐喻个人形而上精神空间的“文人屏”和承载形而下世俗实用功能的日用屏等流脉。其中，白居易庐山草堂的素屏，作为“文人屏”确立的“典范”，得到了周详细密的评析。第六章是全书最后一章，探讨屏风与女性空间、性别伦理的关联，或因篇幅所限，并未深究，留下的话题却意味深长，在屏风撤退或变形之后的时代仍需面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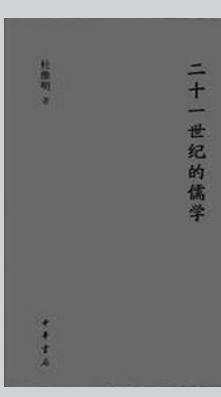
《特权:哈佛与统治阶层的教育》，(美)多赛特著，珍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5月出版



据书中简介，这本书的作者是《纽约时报》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评论版专栏作家。他1979年出生，1998年至2002年就读于哈佛大学。从书名看，《特权》这本书很像是一本发表评论的书，但实际上，它全部的9章内容，总体上都是作者对自己四年大学校园生活的回忆性叙述。而且，这种叙述采用了最平常的方式，按着时间先后，从一年级入学第一天开始，一直写到毕业离校那天。除了出于私人隐私的考虑，对自己同学的名字做了改动，全书所述应该可以当作跨世纪前后那四年哈佛大学校史的一份个人化的纪实见闻。译者根据新闻史料为书中许多细节添加了信息详实的脚注，佐证了书中涉及的哈佛校方和某些老师的奇闻趣事甚至不雅事迹，都并非虚构。书中这些细节比比皆是的自然流露，表明作者写这本书，既不像要炫耀自己名校出身或为母校唱赞歌，也不像是要存心揭母校的黑幕，更像是为了展现自己确实是对自己校园生活的回忆性叙述。而在“古老的男孩俱乐部”、“苏珊娜·帕美的‘奇异生涯’”等故事的讲述中，则显现出了哈佛校园文化里骄傲、虚伪和扭曲的一面。“求知的门径”、“爱情故事”等篇章，把哈佛的课程教学和校园恋爱，完全祛除了“超凡魅力”，还原到了和任何一所大学同等散漫的地步。正是由这些给哈佛褪去光环和色彩的叙述做支撑，贯穿全书的一个观点——哈佛这样的大学是以巩固美国社会统治阶层的特权为本质的，才得到了格外显著的反衬和强化。

▼书者言书

▼书评



儒家的精神性人文主义

儒家在今天应该如何自我定义的课题，是一个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困难重重的问题，最明显的困难之一是，回顾中华民族数千年光辉灿烂的精神文明，儒家传统在儒释道三教中最为源远流长，但同时近百年来儒家又有着受到摧残最为惨烈的文化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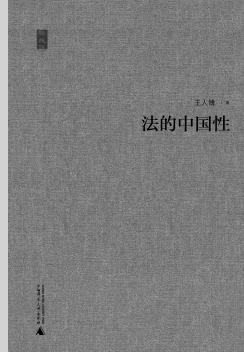
我对儒家哲学的诠释一定打上了“新儒家”的烙印。对此，我欣然接受而且引以为自豪。但是，1962年以来，我的学术生涯和英语世界密不可分。我不是基督教徒，但我是基督神学乃至一元神宗教哲学的受惠者。我涉猎朝鲜、日本、越南和欧美儒学有年，养成了从文化中国之外观察儒家的习惯，因此不接受儒家只是中国文化自我表述的观点。同时，我也和印度、阿拉伯等各地的哲学家、宗教家有丰富的交流。我更能欣赏他们从不同文化类型与价值取向，而不是从品质优劣或发展先后，来理解中西印三大文明的差异。

儒家做人的道理，通过文明对话，已经和世界各国各种精神传统结盟，成为21世纪超越“世俗人文主义”的世界公民的共通语言。事实上，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面对人类存活问题的挑战，除了自己特殊的信仰语言之外，还必须发展世界公民的语言。应该强调，21世纪的儒家虽然批判“启蒙心态”在当今世界的负面影响，但我们充分肯定具有启蒙特色的现代价值，如自由、平等、理性、法治、民主、科学和个人尊严。

几十年来当我们正在各地积极参与落实儒家现代化的具体方案时，世界思潮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半个世纪以来欧美的前沿思想，如女性主义、生态意识、文化多样性、宗教多元性及社群理论，都对启蒙心态进行严厉的批判。如何超越人类的自我膨胀、工具理性的冷酷、浮士德欲望的宰制、性别歧视、种族歧视、霸权主义、男权中心和占有性利己主义的泛滥，已成为西方最有前瞻性和影响力的思想家共同努力的方向。德性伦理、角色伦理、责任伦理、社群伦理和关怀伦理在哲学界大行其道，肯定“身体”的价值、敬重“地方知识”和关爱地球已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共识。这都指向一个不争的事实：一种崭新的人文主义欲之欲出。

(《二十一世纪的儒学》，杜维明著，中华书局2014年7月出版)

寻找“中国性”



这些年读书思考的一个圆心是中国人的中国性。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外国人曾经写过的一段话：(中国人)怀着被礼貌隐藏起来的不屑和厌恶，他聆听着一些(外国的)外交官认真而不合时宜的劝诫关于在中国修建铁路的好处，他看到了潜藏于评论之下的自私，于是立即高采烈地认真讨论起演讲者大衣纽扣的价格……这是19世纪晚期来华传教的美国人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于1900年在《真实的中国问题》一书中的话。这段话是作者对同时期在华传教士——包括他的同乡、比他出名得多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对“中国人缺乏逻辑思维”这个西方命题的“佐证”和回应。白种人的优越感不在于他们的傲慢，而在于把中国人特有的“礼貌性拒绝”都当作思维方式的弱点。在这个问题上，就是鲁迅也免不了被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气质》一书附体，无法脱身。譬如，有关“面子”这个中国概念，好像“面子”就是中国人“黄脸”的皮外特征。

什么是中国性？中国人有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也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和吸纳别人的东西，但倾听和吸纳的方式又是自己的；他们可以接受西方，但强加的不行。中国接受外物的方式与西方相比，总是差那么薄薄的一层，既捕不破，也丢不开了。一个怀揣人类理想的民族要想真心帮助这个民族的一个前提，就是首先要对它尊重，哪怕在助人者看来有些东西如此的不可思议。“本土化”这个词在别的地方意味着要倍加努力，而在中国却是稀松平常。这块土地既不是“大染缸”，也不是漂白剂，事实的真相只有一个：它有13亿人，要想一个东西能让这么多人接受完全不可能；即便接受，也要经过他们的七嘴八舌，最后他们会骄傲地说，“那东西原本就是我们自己的”。

(《法的中国性》，王人博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

▼书评

物联网催生的零成本社会

□杜跃进



成本趋近于零时，商家将无法收回投资，利益相关方也无法获得满意的利润，行业巨头会因此争取市场份额以建立垄断，阻碍“看不见的手”引领市场达到生产和消费近乎零成本的最有效模式。针对这一似乎无解的矛盾，里夫金预言，资本主义时代正在淡出世界舞台，新兴的物联网正在催生一种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新经济模式：协同共享。在未来几年，几乎所有的经济领域都将引进“零成本”模式。在全球协同共享模式和各经济体依赖性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人类正迈入一个超越于市场的全新经济领域。

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我们，也日益感受到这种新的数字化技术和力量的影响。它不仅是更为便捷的工具，更是快速拓展发展空间的力量。无论是旅游、租车、零售等典型消费经济，还是金融、

电信、传媒、医疗等高壁垒行业甚至一些更为复杂、高端的领域，也开始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化。

有识于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将物联网确立为培育核心竞争力的战略重点。美国已明确将物联网上升为国家创新战略的重点之一；欧盟制定了促进物联网发展的14点行动计划；日本计划将物联网作为四项重点战略领域之一；韩国将物联网作为三大基础建设重点之一。可以说，全球新一轮物联网浪潮与物联网产业发展的竞争大幕已然拉开。中国也开始了积极的部署和行动。2011年，工信部制定了《物联网“十二五”发展规划》，提出要重点培养10个物联网产业基地和100个骨干企业。

青铜器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历史变迁的一个个节点都表明，科技创新是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原动力。对于在“三期叠加”中艰难转型的中国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如何将这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化作推进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契机，成为摆在当代中国人面前的严峻考题。我想，终极答案可能只有一个：通过“真枪真刀”的改革，最大限度地突破思想牢笼，最大限度地破除利益固化藩篱，最大限度地激活市场主体，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以科技创新为先导的生产力。

(《零成本社会》，[美]杰里米·里夫金著，中信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

▼印象



珍品无国界

□秤子

画像》《盛开的杏花》等几十幅梵高留于世上的名画。对于普通参观者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可以大饱眼福，在梵高用色彩构成而仍然具有鲜活生命力的画作面前好好欣赏。如《盛开的杏花》这一幅，是梵高为数不多的可以确认是在愉快心情下完成的作品。他曾写信给弟弟说：“一两天前我开始画这幅画，想把它放到你们已为人父母的卧室里，广袤的蓝色天空与硕大的杏花枝形成对比……我画得

很从容，笔触非常坚定。”艺术收藏的欣赏如同音乐之美，是没有国界之分的。伟大的艺术品所表达的意境，不同人种不同语言都能理解和感受。看着这套书，是不是可以想象着为将来有可能的旅游整理出一个艺术指南？因为这套书的最后一册，写下了书中艺术珍品的索引、博物馆的地址、开放时间及参观者的要求，还有乘车路线及博物馆的地图。如此贴心，更值得读者收藏。